

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

战斗在冀鲁豫 平原上

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

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文艺组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李佩衡
封面设计 曹辛之
技术设计 薛楠

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

中共冀鲁豫党史工作组 文艺组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插图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0

书号: 10115·785 定价: 2.35 元

ISBN 7-221-00131-6/I·45

前 言

申 云 浦

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奉献在读者面前了。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冀鲁豫边区位于大名、临清、济南、徐州、开封、新乡、安阳之间，地处冀、鲁、豫、皖、苏五省结合部，约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英雄的冀鲁豫边区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战胜了历史上罕见的旱、涝、蝗等自然灾害。不论敌人如何凶残，生活多么艰苦，全区军民始终英勇顽强，坚定不移，使边区成为联系华中、太行和大后方延安的重要纽带。

解放战争时期，冀鲁豫边区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国民党反动军队反复较量的战场。这里，不仅刘、邓首长组织指挥过近十次具有深远影响的胜利战役，而且还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反攻起点。为了支援战争，从1946年8月至1948年8月的两年中，整个冀鲁豫地区就动用了支前民工六千五百一十七万多人次，畜工六百五十八万多个，几乎所有的劳力，都在为战争效力，对取得历次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很大作用。

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在战争年代付出过巨大代价，做出过重要贡献，屡受中央军委和刘、邓首长表扬的地区，却一直鲜为人知。迄今为止，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中国抗日战争史稿》等仅有的几种书籍做了一些必要的记载之外，不仅中国共产党党史讲义、中国革命史一类书籍，甚至全国通用的高等院校文科公共课选用教材，以及有影响的史学家编写的解放战争简史，都没有一次提到“冀鲁豫”，好象从来就没有过这样一个解放区。连一些人所共知的重大战役资料，包括1947年7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所发起的几次战役，都只字不提“冀鲁豫解放区”，却笼而统之地误称之为“鲁西南地区”。至于反映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历史的文艺作品，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1983年，根据中央指示编写冀鲁豫边区党史的精神，由散在各地的原冀鲁豫区一些领导同志组成了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为了宣扬英雄的冀鲁豫人民战争年代的光辉业绩，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于1984年承德会议上决定成立文艺组，组织以反映冀鲁豫边区革命斗争历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并在同年10月于新乡召开了第一次文艺座谈会，建立了组织，统一了认识，制定了规划，展开了工作。

我们文艺组的同志，多数不是专业文学工作者，但却大都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亲历目睹的见证人。我们觉得有责任来歌颂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有责任来歌颂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先烈，有责任来歌颂那些默默无闻而又无所畏惧的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以激发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四化大业服务。我们认为，这样做不仅对今人，而且对子孙后代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组织文艺创作所依据的方针是，文艺形式尽可以多种多样，但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大的历史背景要真实，重大历史事件的主要事实要真实，一切重要历史人物经历的主要方面要真实。在这些大真实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如果离开了大真实，根据道听途说的情况，去任意编造，不仅违背了党史文学的基本原则，还可能带来意外的不良后果，这都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一年多来，我们在冀、鲁、豫、黔四省和有关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以及文艺组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创作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三十多种，约在二百万字以上。从质量说，虽还不够理想，却为进一步修改成为优秀作品打下了基础，为弥补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文学创作的空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实现我们多年来的愿望，决定从这些已经完成和即将完成的作品中，挑选一些质量较好，和基础不错的，加以研究修改，有计划地编辑出版；出版单位虽有所不同，但都在我们统一的编辑计划之内，都是冀鲁豫解放区文艺丛书。

当然，我们所编选的文艺丛书，尽管有的出自领导同志和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之手，尽管我们和作者一起做了多次修改，毕竟由于我们多数同志水平不高，因而多数作品都还有不少缺欠。但我们认为，只要这些作品对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我们伟大民族的道德文化素质，能够起到一点有益的作用，我们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1986年8月28日

目 录

前 言.....	申云浦	(1)
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	杨得志	(1)
诞生在山洞里的抗日游击队.....	张北华	(62)
血溅郾城“鸿门宴”.....	冀镇国 口述	
	姜克夫 执笔	(90)
血火春秋.....	韶 华	(115)
济南越狱斗争纪实.....	温元著 胡 痴	(124)
李汝秦武工队三插敌后.....	田牧军 胡敬洪	(144)
在刘邓大军的九次战役中.....	陈勇进	(274)

战斗在冀鲁豫平原上

杨 得 志

编者按：本文选自杨得志同志的回忆录《横戈马上》第五章（原题为《在民族危亡的岁月》）的三、四、五节。

抗日战争时期，作者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他以朴素的语言描绘了在冀鲁豫平原的六年战斗经历，内容真实生动，既是一篇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良好教材，也是研究我军历史的宝贵资料。本书编用时重拟了现用标题，并做了些小的删动。

一、向冀鲁豫挺进

1933年春，日寇扩大侵华战争，调集曾参加过淞沪战争的主力 和 驻华北重点地区的部分兵力，企图占领战略要地——徐州，彻底打通津浦线。这样，它在华北地区的兵力便相对减少。为了在冀、鲁、豫平原开辟、发展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上国民党抗日的部队在徐州一带作

战,毛泽东等同志发出了关于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力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的精神,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其中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一部分和二二九师的主力部队,接受了由太行山向冀南、豫北发展的任务。

因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同志有病,这年夏天,朱老总指挥命令我由六八五团去三四四旅任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

当时,三四四旅旅部住晋东南长治附近高平县的安昌村。八路军总部驻故县村。两地相距不远。据说长治市自秦汉置郡以来就是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这里,四面环山,形成一个小盆地,夏季气候异常炎热。我去总部朱老总那里接受具体任务的时候,机关的一些同志正坐在树荫底下,学习研究毛主席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讲演稿。朱老总戴着眼镜,手里拿着一本油印的讲演稿,见我来了,扬了扬,问:

“毛主席的这个讲演稿,你读过了吗?”

我告诉朱老总我从介休赶到旅部后,才见到毛主席的讲演稿,读是读过了,领会得却还很肤浅。

朱老总摘下眼镜,说:主席说了二十几个问题,很重要。各方面都讲到了,讲得很全面。特别是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要我们有耐性,不要犯急性病。抗战一开始我们就坚信日本不可能灭亡中国,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一天两天也打不败他们。

他拿起毛巾擦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接着说,战争嘛,就是政治、经济、兵力和武器装备、指挥艺术的较量,看谁的优势强!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民心所向,或者叫作政治优势,这是任何敌人所无法和我们比拟的!毛主席说“兵民是胜利之本”^①,有了这一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76页。

朱老总谈到我们的具体任务时说，海东同志身体不太好。你是代旅长，要把所有的工作“带”起来。前一段，中央派徐向前、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到冀南去了。你们去的这一片，属于冀鲁豫三省边区，是古战场。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著名的城濮之战、楚汉相争、官渡之战、朱仙镇破金，以及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等都发生在这一带。如今，这里对确保太行山，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南下和西进，起着巨大作用。所以，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里。任务艰巨啊！

我对朱老总讲，冀鲁豫地理位置的重要我知道一些，但对在平原作战，特别是在敌后作战，自己还缺乏经验。

朱老总说，困难不会少的。而且你这次去，号称一个旅，但你的政治委员黄克诚同志和主力部队不能马上和你一起走。你和崔田民只能带一点部队先去，所以叫做开辟根据地嘛。朱老总特别强调了“开辟”两个字，他还指出在那个地区很早就有我们党的工作，也有一些革命武装力量，群众基础也还不错。另外，还有不少有志于抗战的上层人士。至于平原作战，可以学嘛！当初上井冈山的时候，谁想过要强渡大渡河，要过雪山草地，要在平型关打坂垣师团呢！

朱老总的话把我说笑了。

朱老总见我汗水直滴，叫警卫员拿来一个西瓜切开，一边让我吃，一边继续说：到那个地区后，对日军作战我倒不怎么担心，因为据了解，那里日军主力比较少，但汉奸、顽固派、各式各样的杂牌军、“土匪”，多得很。群众反映，那地方的“司令多如牛毛”哩！怎么办呢？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中国要战胜日本有三个条件，而主要的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①。工作艰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80—481页。

苦，形势和斗争也会错综复杂，不过我看没有啥了不起的嘛！

朱老总总是这样，在谈古论今，闲聊似的谈话中启发我们，教育我们，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得到提高，学到许多既有理论又有实际的东西。

根据朱老总的指示，黄克诚同志和我研究确定，将六八七团（团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留晋东南，我和旅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带着一百多人去河南滑县，与先到那里的韩先楚（团长）、康子祥（政治委员）等同志领导的六八九团会合。

三四四旅原来是红十五军团的底子，战斗力很强。但是我对这支部队的状况很不熟悉。所以，在黄克诚政委不在的情况下，如何带好部队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心中不太有底。黄克诚不仅年长我好几岁，而且早就是红三军团的领导人之一，为人正派耿直，原则性强，又有丰富的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经验，我很尊敬他，思想上也有些依赖他。因此我便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

黄克诚同志听罢我的话，在自己的头顶上划了个圈，笑着说：“你有这些想法不奇怪。平型关战斗后上级派我来的时候，我也有过类似的思想。这次朱德同志亲自找你谈了话，任务交待得很明确，老杨，这种时刻派你来接替海东同志的工作，担子满重的啊！关于这支部队的情况嘛，一是去了以后就会慢慢了解的；二嘛，崔田民同志是老陕北，他可以协助你；第三，大家都信任和支持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告别留守部队和安昌村的群众时，黄克诚同志一直把我们送出村外老远。他握着我的手说：“你们先去打前站，说不定哪一天我们都得去。有什么情况我们及时联系，好在离得不算远嘛！”

这时已经是1938年的9月了。

我们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行军，翻过太行山，从豫北的淇县、汤阴之间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在滑县地区同六八九团会合了。沿途这一带虽未被日寇侵占，但由于国民党政府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地方反动势力的敲诈勒索，土匪的胡作非为，以及洪涝灾害，群众生活十分贫困，精神非常紧张。为了防范“兵匪”的骚扰，几乎村村寨寨都修起了土围子。我们经过的许多村庄，老乡们也都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大人们躲着不照面，只有一些面黄肌瘦的孩子，瞪着一双双惊恐好奇的眼睛，远远地望着我们。但是到六八九团驻地，情况却完全相反，群众的衣着虽然也相当破烂，但情绪高涨。他们欢迎我们，送茶送水，问长问短，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喊着：“快来看啊！又来了八路军的大部队啦！”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部队受到很大的鼓舞。

“你们的群众工作搞得很好呀！”我对韩先楚同志说，“有些什么经验，给新来的同志们介绍介绍嘛！”

韩先楚团长这位1928年参加红军的老同志，操着一口湖北红安话说：“什么经验？还不是咱们那老一套——事事严格纪律，处处爱护群众，尽力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困难。再加上一条，就是对敌、伪、顽和土匪不客气。打几个胜仗，替群众撑腰、出气这就行了！”

韩先楚的话说得简单，但我知道眼前这一切他们是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巨大的代价的。

韩先楚还告诉我，我们党的直南（指河北省南部，因该省曾称直隶省而得名）特委成立以来，陆续在各地成立党组织，发动群众武装抗日。但由于这一带反动势力比较大，党的活动暂时还处于秘密或半公开的状态。目前虽有了几支游击队，但武器装备很差，成分也比较复杂，思想政治工作又没有跟上去，所以战斗

力比较弱。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的统一领导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坚力量不强。他最后说：“你们来了就好了。”

“你们搞得不错，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说：“我看，关键问题还是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就我们来说，要多打几个胜仗，煞煞敌人的气焰，鼓舞群众的情绪。一句话，局面已经初步打开，经过大家的再努力，形势会越来越好的！”

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我们胜利会合后没有几天，总部指示我们堵截在冀南地区受到宋任穷、陈再道等同志领导的部队沉重打击后，正在向南逃窜的一股伪军。这股伪军的头目叫扈全禄，原系国民党军。我们从滑县经浚县过平汉路追到汤阴以西，将扈全禄部全部歼灭。俘虏伪军一千四百多人，其中还有两个旅长和一个团长。这一仗打得顺利、漂亮，在当时当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大胜利。滑县县城从此得到解放。由于军事上的胜利，特别是中央加强了直南特委，我们在特委的领导下，又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基本上肃清了平汉路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内的伪军和土顽部队，开辟了一大片游击根据地，建立了安阳、汤阴、内黄等县的抗日政权。

深秋，卫河流域发生了严重的鼠疫传染病。为了在少医缺药的情况下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部队的战斗力，上级要地方党组织尽力安排好群众的预防和治疗，同时指示部队返回晋东南，在长治、高平（县）一带进行冬季练兵。

1939年的元旦，我们是在长治以南的柳林村过的。白雪皑皑的太行山，雄伟壮丽；银装素裹的长治盆地，千姿百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正兴高采烈地筹办春节，热闹非凡。在烽火连天战乱不已的年月，能看到这样一种比较和平宁静而又热烈欢腾的

气氛，给人以巨大的安慰。

过了新年不久，1939年2月初，我和崔田民又一次奉命东进冀鲁豫边区。

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冀鲁豫扩大部队，待命回山西。

由于那一带有了一定的群众武装，这次我们由山西高平县出发，只带了一个工兵排和一个炮兵排，总共不足一百个人。黄克诚同志担心我带的人太少，要我再带点部队。我把和崔田民研究的意见告诉他说：“太行山是日寇目前扫荡的重点，更需要部队。根据我们的体验，冀鲁豫边区地带是把‘干柴’，一点就能燃起熊熊大火。既然总部要我们去扩大部队，你就放心吧！”

我们出壶关，经合涧，在汤阴以南宜沟过平汉路日寇封锁线的时候，正值春节。但车站附近的气氛同我们刚刚离开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相比，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节日的欢乐气氛一点也没有，冰雪遍地，寒风凛冽。看到的尽是衣着破烂、携家带口的难民。孩子哭，婆娘叫，老人们拄着拐棍四处乞讨。他们失神的眼睛望着我们，也许因为不了解我们，眼神中似乎还有些恐惧。

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啊！战士们心里很难过，他们谁也没吭声，只是默默地掏出自己为数不多的口粮，放在一双双伸过来的、干瘦如柴的手里，眼里无不饱含着热泪。

我的挑伕老谢，一位江西老倌，把自己身上的口粮全部送光了，又在他挑的破箱子里寻找着什么——那里边除了地图、文件，还能再有点什么呢？

我让警卫员把我的口粮交给老谢，让他送给群众。“不！”他说，“你的口粮一粒也不能动！”

这位老谢同志，年龄比我大，当挑伕的时间也不短了。他身

上凝结着中国农民忠厚质朴的美德，曾经多次负伤，身体不怎么好。我动员他不当挑伕，去当上士管管伙房。他说：“我一不识字，二不能算帐，顶个上士的名不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干！”我动员他去当马伕，那活比挑伕稍轻一点。他说：“我没有经验，喂不好马，误你的工作，万一让马踢了还得分你的心，让大伙照顾我，不去！”我说：“你总不能跟我当一辈子挑伕呀？”“当一辈子挑伕又怎么了？”他有点急了，“你现在离不开我，未必日后就能离开我。只要你还打仗，就得有地图，有文件。有这些东西就得有箱子放。有箱子就得我来挑。”

这就是老谢。

老谢多年来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在战场还是到驻地，看见什么人家不要的破布烂绳、针头线脑的总拣起来放着。年轻的战士们和他开玩笑说：“老谢，你拣这些破烂下小崽呀！”他不笑，只是说：“年轻娃娃懂个啥？日后总有用。世上没有白费的东西哩。”

这就是老谢！

老谢不让警卫员动我的口粮，却从箱子里翻出两块老羊皮。“这还是在陕北一次战斗中拣来的哪！”他说着把羊皮披在两个浑身发抖的孩子身上，挑起担子走了，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那两个也望着他的孩子……

这就是老谢。

他用无声的语言给大家多么大的力量啊！

我们过了平汉路，从五陵集渡卫河，在浚县与内黄之间的井店一带与刘震同志带领的一个大队会合。这个大队当时只有一个营的兵力，是从三四四旅三个团各抽一个连组成的。我们从这里经濮阳到达鲁西南边上的东明地区，同地方党建立起来的两支游击

队，组建成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

冀鲁豫支队由我任支队长，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后为政治委员），卢绍武任参谋长。支队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长刘震，政治委员李雪三；二大队长覃健，政治委员常玉清；三大队长鲍启祥，政治委员刘汉生。共约二千多人。以后还增加了四大队和五大队。四大队大队长是吴大明，是一个在“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拿起枪来一致抗日”的口号鼓舞下，背叛地主家庭的同志，拉起队伍组成了四大队。五大队主要是由当地一支成分相当复杂的部队改编过来的，大队长是胡继成。这时整个支队约四千余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冀鲁豫边区由我们党统一领导的一支比较早的抗日武装力量。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精神，我们的任务是在这片土地上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活动，壮大抗日武装，建立民主政权。

开展工作比较困难、花力气最多的是鲁西南地区，也就是现在菏泽市周围的东明、定陶、曹县、成武、金乡、巨野直到梁山这一片。菏泽又名曹州，是著名的牡丹之乡。据说从明朝嘉靖年代就开始种植这“花中之王”，有红、黄、蓝、白、黑、绿、紫、粉等多种颜色和三百多个品种。但我们来到的时候正值春末，不但不见牡丹，群众连粮食都吃不上，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菏泽东北的梁山县，是《水浒》故事中梁山泊英雄们聚义的地方。我们来的时候，距宋江起义已近千年，只能看到一些传说中的“宋江寨”，“忠义堂”，“阮氏三雄故居”等遗迹。当时这里有两多：一是土匪强盗多，而且几乎所有的土匪头头都有绰号；二是土围子多，而且土围子都比较高、比较厚。群众的房子却很简陋，是用高粱杆糊上泥巴盖起来的。

由于受敌、伪、顽反动宣传的影响，我们刚到时，群众一见

便往土围子里跑，跑进去就把围子门关得紧紧的，男男女女抄起大刀、梭标，架起土枪、土炮，大喊大叫着不许我们靠近，气氛十分紧张。

进不去围子我们就在外面做群众工作。围子里的群众见我们不攻打他们（他们知道凭我们的武器装备攻打他们是 不成问题的），不侵犯群众的利益，说话又和气，慢慢地白天把围子门打开，让我们过路。但只许过路不许停宿——现在想，那也许是对我们的考验吧。后来，他们主动让我们在里面休息，有时还送些开水来。利用休息的机会，战士告诉他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来和他们一块打鬼子，打汉奸，打土匪的；喝水给钱，因为开水是柴火烧的，而柴火是他们砍的。不仅喝水要给钱，损坏了盆子、碗也得赔钱，这就叫八路军的纪律。这样的工作崔田民政委和我都亲自做过。这样的事情做多了，有的青壮年就说：“你们这伙子队伍俺们看真不孬，可就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打得鬼子和汉奸，保俺老百姓过安生日子。”有的老年人问：“你们叫什么支队，支队最大的官，有没有俺们这里的司令大呀？你们有多少兵？”那时候鲁西南土匪部队不少，司令多如牛毛，群众确实搞不清楚。

我和崔田民、卢绍武等同志分析了这些情况，觉得通过工作，群众在了解我们的基础上，对我们的感情加深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打败日寇和汉奸，但又不那么相信。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取得群众的完全信赖，最有说服力的是打些胜仗给他们看看。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四月底我们夜袭了金乡县城的日寇守军；接着在金乡县白浮图袭击了日寇的一个汽车队。那天敌人没有准备（主要是他们没有想到会有人“敢”打他们），一接火他